

朱佳木 著

我所知道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

当代中国口述史
Oral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当代中国口
Oral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我所知道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

朱佳木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朱佳木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9

(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

ISBN 978-7-80170-750-5

I. 我… II. 朱… III.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
史料 IV. K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7645 号

出版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陈捷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装帧设计 古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152 66572264 66572154 66572155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兴华印刷厂
开 本 68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0.75 印张 2 插页 插图 48 幅 82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目 录

一、引 言 / 1

1975年邓小平复出抓整顿，决定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牵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政研室被“四人帮”指为“邓记谣言公司”、“翻案风的黑风口”。

“四人帮”粉碎后，出现“两个凡是”的方针，政研室不仅不能恢复工作，反被勒令撤销。

直到邓小平再次复出，政研室才得以保留，胡乔木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改名后的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并出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

二、会议之前的若干情况 / 15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但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和全会要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后来全会公报说的那些内容。这个变化是偶然的、突然的，还是必然的、或迟或早总会发生的？

(一) 关于确定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 17

早在1975年，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实质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在东北等地“点火”，提出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底”在哪里的问题，实质仍然是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决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胡乔木针对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关于重点转移是国内国际形势需要的说法，指出这个理由不妥。

(二) 关于要求对经济体制进行认真的改革 / 29

三中全会前，党内高层对改革开放政策的酝酿已相当成熟。就连“改革”和“开放”这些概念，在邓小平讲话中也已出现。

1978年夏秋，国务院召开务虚会，李先念在会议总结时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透露了陈云在1956年“三为主、三为辅”设想基础上的进一步思考。

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同时进行的，还有一场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在邓小平直接支持和指导下，国务院研究室在《人民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它比《光明日报》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还早六天。

(三) 关于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 49

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早在中央工作会议前就开始了。尽管进展缓慢，但毕竟使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这为中央工作会议上力量对比的变化提供了组织保证。

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复出这两件大事被一拖再拖。陈云与王震等人相约，于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尽快解决这两个问题。会议简报组要求陈云同意在简报中删去这些话，华国锋为此登门劝说，均遭到他的拒绝。这篇发言虽然没上简报，但却为加快邓小平复出发挥了作用。拨乱反正的序幕由此拉开。

(四) 关于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提出健全民主与法制、加强党内民主集中制 / 59

最早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的和最早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的都是邓小平。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

也纷纷写文章，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他们的启发和鼓舞下，理论界发起和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对于发扬民主、健全法制问题，党内高层在三中全会前也已触及。邓小平对胡乔木等人说：“现在关于民主的问题讨论得不够，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展开讨论。”“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

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

三、会议中间的若干情况 / 69

（一）关于会议的一般情况和特点 / 70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都分六个组，但人员构成不完全一样。把两个会合在一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1月12日到11月25日是发动阶段，11月25日到12月13日是深入阶段，12月13日到12月22日是总结阶段。

两个会有三大特点：一是议题中途发生了违反主持人意愿的改变；二是持续时间长；三是气氛热烈、活泼，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同时具有以上三个特点的会议，在党史、国史中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其少有的。

（二）关于会议的大致过程 / 72

11月10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华国锋宣布会议议程，并说从明年一月起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对在运动中没有处理完的某些冤案、错案的平反工作，交由有关机关继续解决。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作题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的发言，它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左”倾错误开的第一炮，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关键性作用。

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北京市委关于1976年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的决定。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新华社通稿。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政治局宣布,对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问题、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杨尚昆问题予以平反,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予以撤销,康生、谢富治问题交由中央组织部予以审理。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听取北京市委和团中央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社会反应的情况时发表讲话,主要是邓小平讲。从这以后,中央工作的主导权逐渐由华国锋转到邓小平手中。

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说,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对中央人事安排,只能上,不能下;政治局至少加陈云、邓颖超、胡耀邦三人,王震也够格,中央委员也要补选几个。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闭幕会。邓小平发表的重要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宣言书。华国锋在讲话中检讨了“两个凡是”方针的错误,肯定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提出今后不要再称“英明领袖”,文艺作品也不要再宣传他个人。

12月18日,三中全会开幕。

12月22日晚,三中全会闭幕。陈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第一书记,并发表简单讲话,高度评价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

12月23日晚,三中全会公报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公布。

(三) 关于会议讨论最多的几个问题 / 94

1. 关于历史遗留问题。中央工作会议各个组都表示,陈云同志提出的问题是当前干部群众讨论较多、影响全局的问题,希望中央

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之前，把这些问题解决好。/胡耀邦说：我赞成把“文革”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搞清楚，这关系安定团结，关系实事求是的作风，关系维护毛主席的旗帜。/万里说：陈云同志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畅。

2. 关于个别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因为提出了历史遗留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很自然地联系到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会有阻力，阻力来自哪里？/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四位政治局委员身上。他们或作了检查，或提出辞职，但中央直到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才批准他们辞职。

3. 关于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在会议第一阶段，讲这个问题的人不多，对这个问题的热烈讨论在11月25日之后。它几乎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形成众炮齐轰的局面。/受到大家批评的几位宣传口的负责同志，也都程度不同地作了检查。

4. 关于中央人事安排和宣传领导部门人事调整的问题。代表们谈的最多的意见有三个：第一，汪东兴应辞去各种兼职；第二，陈云应担任中央副主席；第三，胡乔木应负责意识形态工作。也有不少同志谈到胡耀邦、王震应进中央政治局。

四、会议文件形成的若干情况 / 121

十一届三中全会共形成12个文件。其中，胡乔木主持起草或最后改定的有5个，即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全会公报，以及农业问题的决定、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和华国锋在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一) 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稿 / 122

讨论并提交三中全会的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稿，是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但代表们普遍对这个稿子不满意。中央决定由胡乔木负责修改。此后，他一边参加会议，一边重写这个文件，最后总算拿出一个令代表们满意的稿子。

(二) 关于邓小平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 126

邓小平的讲话稿早在1978年10月下旬就由他本人布置胡乔木做好了。原稿主要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展开。11月19日，胡乔木按照邓小平16日审阅后的意见，再次做了修改。

华国锋在11月25日宣布了一系列平反决定，尤其天安门事件公开平反后，会场内外形势发生重要变化，使邓小平原来那份讲话稿已不再适用。

针对新的情况，邓小平自己草拟了一份新的讲话提纲，并于12月2日找胡乔木等人谈话，要他们按这份提纲重新起草讲话稿。由于胡乔木正在赶写关于农业问题的决定，所以请国务院研究室同志先按邓小平的意思起草。

邓小平为新的讲话稿共找人谈过四次话，胡乔木参加了三次。初稿写好后，胡乔木至少改过两遍。最后一次修改，在闭幕会之前两小时才脱手。由于时间紧迫，讲话稿被直接送到了邓小平家中。

(三) 关于叶剑英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 133

由于会场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央党校同志为叶剑英准备的讲话稿也已不适用。叶剑英身边的人为他重新起草了一个稿子，并拿给邓力群修改。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叶剑英要求讲话稿在印发三中全会前请胡乔木再改一下。

(四) 关于全会公报稿 / 136

中央工作会议临近结束时，华国锋约胡乔木谈话，请他主持重新起草已由中办研究室写好的全会公报稿。胡乔木说，公报要真正反映出这个会是历史上的重大转折。要使人们看到我们纠正了错误，同时又提高了党的威信，看到我们党是有希望的，从思想上把人民团结起来。

公报草案赶在全会最后一天送到与会者手上。胡乔木第二天对公报稿作了进一步修改，在送政治局常委审定后，于当晚8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

(五) 关于华国锋在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 144

三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华国锋把自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稿也送请胡乔木修改。

五、结束语 / 145

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有两个：一是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二是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在建国后伟大转折的实现和共和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它将永载史册。

1

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引言

今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0 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为此，当代中国出版社约我把 10 年前写过的《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文加以补充修改，印成单行本出版。

当年我所以写那篇文章，是应当代中国研究所之邀，去为他们举办的“新时期历史座谈会”讲述我知道的那段历史。而他们所以邀我去讲那段历史，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会儿，我刚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

2



胡乔木（左）与本书作者合影（1977年6月）

乔木同志的秘书。

记得我在那次座谈会上发言的开头曾讲过一段话，大意是：我虽然有幸经历了那个历史事件，但只是作为乔木同志秘书去的，了解的情况和对问题的理解都很有有限；而且手头急事又多，抽不出多少时间作准备，讲述中难免有片面的、遗漏的、不准确的地方。不过，既然我经历了那段历史，接触到了一些别人不大知道的事，确实有义务把这些情况讲出来，以便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写那段历史补充一点材料，提供一些背景。那次发言之后，我把讲稿整理成文，先在刊物上发表，1998年底又收入我的第一本论文集，书名就叫做《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现在，当代中国出版社要把这篇文章抽出来单独成书，背景与10年前相比又有了很大不同。首先，我本人在那次座谈会之后的两年多，也被组织调入当代所，成为了共和国史编研队伍中的一员，要说义务，比起10年前显然更大了。其次，这10年来，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前后后的历史，无论文献档案还是研究成果，比起10年前都不知要丰富多少倍。当年讲的许多片面的、遗漏的、不准确的地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弥补。因此，尽管我现在手头急事依然很多，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尽可能在原有文章的基础上补充修改，使它更加丰满一些。当然，限于了解的情况和自己的水平，以及时间的限制，片面、遗漏和不准确之处还是在所难免，只能请读者明察并给予指正。

为了有助于读者更多地了解我所讲的一些情况的背景，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讲讲我到胡乔木同志那里担任秘书的经过。

那是1975年夏天，邓小平同志继年初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并代替病重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之后，又代替受到毛主席批评的王洪文，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可以说集党、

政、军大权于一身。但问题在于，宣传舆论大权仍然掌握在“四人帮”手里。他们利用报纸、电台等宣传手段、理论刊物和文艺形式，不仅对抗邓小平同志倾力抓的整顿，而且与毛主席的一些正确指示，比如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等大唱反调。

记得那年8月，我在《解放日报》头版上看到一篇题为《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学校工作首位》的评论员文章，指责有的老师“满足于学生上课安静、下课太平”，说什么“决不能离开反修防修的斗争片面追求所谓的‘安静’和‘太平’”，还说“只要阶级斗争存在，上课时下课后就不可能‘安静’‘太平’”。这段话乍一看，可能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上课安静、下课太平乃是关系课堂秩序和学生安全的问题。阶级斗争再激烈，上课也要安静，下课也要太平，根本扯不到什么反修防修、阶级斗争上。但若把其中的“安静”、“太平”换成“安定”、“团结”，再读这段话，它的真实意思就清楚了。其实，它是在用批判满足“安静”、“太平”，影射抓安定团结的工作，是在警告人们，只要有阶级斗争存在，就不可能有安定团结，不能离开反修防修去追求安定团结。

我举这个例子是为着说明，当时邓小平同志主持的党中央要往东走，而宣传舆论却是朝西走；邓小平同志主持的党中央要抓整顿，抓安定团结，抓国民经济，而宣传舆论却别着腿、拧着劲，可见工作开展之艰难。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自主持中央工作后，就决定在国务院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请胡乔木同志牵头，吸收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和邓力群等参加，一共七个人（后来在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中，有人把他们戏称为“七君子”）。这个班子的任务，一是整理、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二是向中央反映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情况；三是替中央起草重要文件和文章；四是代管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并在那里筹办一个理论刊物（即《思想战线》）。其中，第一项任务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负责，下面另有一批工作人员，在中南海的“西四院”办公。另外三项任务由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负责，机构就是国务院政研室本身，下设理论组、国内组、国际组、办公室和一个图书资料室，在中南海武成殿附近的“工字楼”里办公。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宣传舆论先是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把持；“九一三”事件之后，由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把持，其他任何人无法插足。而这时，国务院居然要成立一个涉及意识形态和理论宣传工作的机构，其矛头所向可想而知。这一点，“四人帮”心里明白，政研室的领导也明白。所以，对政研室机构的组建，一直十分谨慎、低调。例如，为了避免领导人的任职问题拿到政治局会上讨论可能会惹出的麻烦，竟省略了正式的任职报批手续，以至于这些领导人直到再次被打倒，还没有正式职务。为了防止内部工作情况泄露出去，对每一个拟调入的干部情况，都要由室的领导人详细了解，严格考察。当然，尽管如此，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还是出了造反派，不过那是后话。

我当时正在一个野战军的军宣传处理论组工作，经人推荐，也被列入国务院政研室的拟调入名单，并很快经过总政治部和北京军区，向我所在的部队发出了转业命令。调令是9月初下达的，但部队起初不大愿意放人，压了一段时间，直到11月初才让我办完转业和报到手续。后来听说，政研室所以调我去，原本是经胡乔木同志本人同意，让我去给他当秘书的。但当我跨入政研室大门时，政治气候已经发生变化。从表面上看，报纸上正借毛主席评《水浒》的几段话大做文

章，批判所谓“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宋江让人招安了”；清华大学在利用毛主席对刘冰告迟群的信所作批示一事，开展起所谓的教育革命大辩论。而更深层的原因是，毛主席因为《科学院汇报提纲》和刘冰的信，认为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态度发生了变化，指示在小范围里对他进行批评。《科学院汇报提纲》是胡乔木主持修改的，刘冰的信是经胡乔木的手转给邓小平的，两件事都涉及胡乔木，既然邓小平同志因此挨批，胡乔木自然在劫难逃。所以，自从我报到后，政研室虽然还在工作，但却停止了进人。当时，机关里一共有41个人，我刚好是那“第四十一个”（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被点名批判的一部苏联电影的名字）。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进入政研室后，并没有去给胡乔木同志当秘书，而是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全体人员合影，二排右起第一人为作者（1977年6月）。

6



被分配到了理论组。

理论组只有六七个人，都是一些思想理论战线上的老同志，组长是王子野，副组长是陈道。那时，理论组正在做两件事，一是根据领导意图写大块文章；二是给正在筹办之中的学部《思想战线》杂志拟选题。王子野同志要我一方面参加拟题，另一方面负责起草一篇关于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但文章初稿还没完成，就传达了“打招呼会讲话要点”（中央23号文件）。这份文件最重要的话就是：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反映，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想翻案。那是12月中旬，从此以后，好转了才几个月的形势逐渐恶化。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逐步升级，调门儿越来越高，把全国人民又装入新的闷葫芦之中。政研室的业务工作基本停顿，整天学习文件、表态、讨论。记得那阵子，机关还组织我们去清华大学看过一次大字报。里面一句话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叫做“主帅摇旗，大将紧从，秀才呼应”。其矛头所指，不言自明。

过了年，周总理的逝世使人们由热变冷的心更是雪上加霜，给本已恶化的形势增添了巨大的悲剧色彩。当我在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时，在长安街人群中目送总理灵车路过时，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总理骨灰的吊唁活动时，到处听到的都是哭泣声，看到的都是小白花。尤其天安门广场，更是人山人海。我亲眼看见英雄纪念碑上堆满了花圈，广场四周松柏树上扎满了白花，而长安街上抬着花圈的队伍还在络绎不绝地涌向广场。但这一切不仅没能给“运动”降温，相反，更刺激了“四人帮”的神经。最近看《邓小平年谱》才知道，那年1月17日，胡乔木等同志已预感到情况不妙，起草了一封给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副总理